

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

曹 翔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 目前学界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似有可商之处。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首先应该根据其本质特征确立科学的界定标准, 然后据此才有可能得出切乎实际的结论。根据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本质内涵, 本文得出了五条鉴别标准。由这五条标准可知, 清人俞樾 1868 年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才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发轫之作。

[关键词] 语法; 变换分析; 标准

[中图分类号] H1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3541 (2005) 04 - 0058 - 05

Discuss the Source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in Chinese Grammar

CAO Xia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n the method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in Chinese grammar seems to correct. It should firstly be defined scientific judging standards before discussing the source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Only according to the judging standards, can we get the scientific result. And this essay gets the five judging standards deriving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thod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in Chinese grammar, with which we make a conclusion that the book GUSHU YIYIJULI (《古书疑义举例》) by YU Yue born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year of 1868 should firstly book applied the method of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Key words: grammar;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standards

一、汉语语法变换分析探源研究的现状

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 变换分析是一种重要而又传统的方法。目前学界对变换分析的理论研究虽然已经相当深入, 但是, 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却还未见专论, 迄今为止, 只有几部论著附带提及, 按观点出现的先后可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 学者们多认为吕叔湘 1942 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是最早运用变换分析进行语法研究的著作。例如, 朱林清的《汉语语法研究史》认为, 吕叔湘的《要略》“首次以‘变换’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各语言单位(主要是词组和句子)和各种句式(句型)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样就将语法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更高层次。”^[1](p.77)]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认为,《要略》“这是国内研究汉语句法结构中

存在变换关系最早的范例。”^[2](p.47)]吴为章的《运用变换理论的先驱》认为,《要略》“是变换理论在汉语句法结构研究中的最初应用。”^[3](p.7)]

后期, 学者们多认为, 刘复(半农) 1924 年出版的《中国文法通论(四版)》是最早运用变换分析进行语法研究的著作。例如, 高更生、王红旗的《汉语教学语法研究》认为, 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 四版附言》是“第一次采用变换分析的方法区分‘在’的用法”^[4](p.10)]。胡明扬的《刘复 中国文法通论 读后》^[5](p.1-5)]一文支持高、王二位的观点,

语法学界为什么会出现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观点? 胡明扬先生的《刘复 中国文法通论 读后》一文中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相当明确的答案。胡先生告诉我们: “近日来读了高更生、王红旗的《汉语教学语法研究》

[收稿日期] 2005 - 05 - 08

[基金项目] * 本文为泰州师专规划课题项目 (04TQ06) 经费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陆俭明《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 年第 3 期)、方经民《汉语语法变换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曹翔《汉语语法变换分析及变换类型研究述评》(载《河海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 年第 3 期)等。

(1996年),在28—29页上看到了刘复《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中使用转换分析的几组例句……刘复在1924年就使用了转换分析,而我对此一无所知!我还一直以为最早使用转换分析的是1942年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胡先生的这番话表明,学者们是根据变换分析出现的时间先后来界定汉语语法研究中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当看到《要略》中存在着变换分析就认定吕著是变换分析的滥觞;当看到《中国文法通论》中存在着变换分析就认定刘著是变换分析的源头。

我们觉得,这种探源研究似有可商榷之处。

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中,对变换分析的探本求源研究,即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我们认为,只根据变换分析出现的先后是不够的。在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长河中,如果单凭变换分析出现的先后来确定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则可能会出现言人人殊的多种解答,那样也就模糊了变换分析探源研究的真实面目。因为汉语语法变换分析并不只包含“变换分析”这么一个特征,变换分析也并不仅仅只运用于汉语语法研究中。

我们觉得,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本求源的研究最根本的是要把握它的本质内涵,只有根据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本质内涵才能把握它的所有特征;只有依据它的全部特征才能确定明确的一致标准;只有根据具体可操作性的标准来检验判别,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事实证明我们的猜想。

我们不妨先依据“变换分析”出现的先后来逆推溯源,看看会得出什么结果。

黎锦熙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在对汉语句法中的“变位”(“变式的主位”“变式的宾位”“变式的副位”)分析中已经较多地运用了变换分析。例如,黎氏在论说“宾位”时指出,有一种外动词能带双宾语,“但是在习惯上,常用一个介词‘把’字将双宾语的正宾位提前”,如“我送张先生一本书”,说成“我把一本书送张先生。”“这乃是介词‘把’字一种提前宾语的特别作用。”^{[6](p.36)}黎氏把双宾语句变换成单宾语句,并指出两者之间的结构上的依存联系,这显然是变换分析的运用,因为所谓的变换分析就是指在句法结构变换的基础上所做的分析。而黎氏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年)比吕氏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年)要早约20年,与刘氏的《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1924年)同一年出版。

在我们看来,《新著国语文法》还不能算是最早运用变换分析的著作。金兆梓1922年出版的《国文法之研究》,已经列出了五类基本句式的变换分析;比金氏的《国文法之研究》更早的还有1898年问世的《马氏文通》,于广元《试论马氏文通的变换分析》一文对《文通》中的变换分析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进而得出“马氏的研究则是汉语变换分析的滥觞”的结论^{[7](p.122)},不过,于先生的观点未引起方家的注意罢了。

溯源至此,《文通》就是变换分析的源头了吗?我们不敢肯定。

从理论上说,变换分析是揭示不同句法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的一种方法,只要存在句法结构的变换就有可

能用变换分析,说得更宽泛些,只要存在句法的研究,就有可能运用到变换分析。而对句法的研究在《文通》之前有俞樾1868年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在《古书疑义举例》之前还有南宋陈藻的《文则》……如此追叙下去,变换分析可以追叙到西汉的训诂著作中。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语文出版社,1994年)一书辟有专章论述汉代训诂著作中运用的变换分析。如此看来,汉代注释著作就是变换分析的源头了,我们仍然表示怀疑。

汉语语法变换分析是以变换为基础的句法分析方法,如果以“变换”为参照点来溯源,那么,变换分析的著作权还可以前推,因为“变换”的运用肯定要早于变换分析的出现。事实正是如此,成书于西汉初年时的《战国策·邹忌讽齐王纳谏》,其中邹忌先后使用过的三个同义问句使我们难以忘怀:“我孰与城北徐公美 吾孰与徐公美 吾与徐公孰美”,作者根据不同的谈话对象,改变句法的结构方式,表达同一个中心语义“我与徐公谁漂亮”,使行文避免呆板而富于变化,以求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这几个结构不同的同义问句实际上构成了变换,“在语言运用中选择、调整句式,即换个说法,是需要的,这就是变换。”^{[8](p.104)}

在比《战国策》更早的历史文献中我们还能发现类似的变换用法。如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韩非子·二柄》中前后的两句话:“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 简公见弑,宋君见劫”,等等。照此推断,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献就是变换分析形成的源头了。我们还是不敢肯定。

二、汉语语法变换分析探源研究的标准

我们觉得,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单从时间的线条上根据变换分析法所具有的某一个特征如“变换分析”或“变换”来逆推,有可能出现歧说。我们如果根据变换分析的本质确定全面的、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那么,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应该能够得出科学的结论。

朱德熙先生1986年《变换分析中的平行性原则》一文从理论上对变换分析做出了总结,陆俭明先生据此指出:“变换分析是一种语法分析手段,变换可以理解为存在于两种结构不同的句法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9](p.71)}可见,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里,所谓的变换分析就是指以句法变换为基础的一种句法分析的方法,换言之,汉语语法变换分析作为一种句法分析的是通过不同的句法形式之间的变换,来显现相关句法结构之间表层的句法联系或深层的语义联系。

由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内涵可知,语法研究中的变换分析首先必须运用“变换”这种操作方法;其次还必须要有句法的“分析”——分析不同的句法结构之间的相

胡先生这里所指的“转换分析”就是本文所论的“变换分析”,见本文所引高更生、王红旗的《汉语教学语法研究》的相关论述。

关联系。

概念的外延是概念内涵的具体形式，是概念所指的每一个具体对象。汉语语法变换分析当然是为汉语语法研究服务，换言之，只有为汉语语法研究服务的变换分析，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其探源研究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反之，则不在我们的探源研究之列。由此，我们得出确定汉语语法研究变换分析存在的三条标准：1. 有句法结构的变换；2. 有句法结构的分析；3. 为语法研究服务。

探源研究当然是界定某部论著是否拥有著作权，所以还必须另外有两条标准作保证：4. 著作者有变换分析的主观意识；5. 同时符合以上四条标准的最早的论著。

这五条标准缺一不可。一是判定的基础，没有变换，就无所谓变换分析。二是判定的核心，句法结构的变换为句法结构的分析服务，没有句法结构的分析，也就无所谓变换分析。而变换分析则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核心。三是判定对象的范围，因为变换分析不仅仅用在语法分析中，它还曾出现在训诂释义中，只有为语法研究服务的变换分析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四是判定的关键，作为著作权的汉语语法变换分析，它还应该是著作者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这一条对探源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王显先生在界定上古音研究所使用的“诗韵系联法”的著作权时指出：“大概从顾炎武起，就都是使用这个方法。不过他们既然没明白地说了出来，那么总结出这个方法，自然只能归功于张惠言。”^{[10](p.12)}顾炎武研究上古韵母，最先使用了科学的诗韵系联法，这是学界公知的史实，可惜他没有明确地指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方法，而张惠言首次把这种方法叫做“丝联绳引”法，所以“诗韵系联法”的著作权只能算在张惠言的名下。同理，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还要看著作者是否意识到自己是在运用这种方法。五是判定的要求，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是寻找并确定著作权，只有掌握足够全面的材料才能得出准确真实的结论。

根据这五条标准，我们现在来看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究竟花落谁家？

我国古代历史文献如《战国策》《韩非子》中只能存在“变换”，只能运用“换一种说法”为行文或表义服务，它们当中不可能出现句法结构的分析，这是这类历史文献的性质使然，历史文献以述说史实为己任，没有必要作句法上的分析，更没有必要作方法论上的总结。因而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绝不会存在于古代历史著作中。

再看早期训诂著作。训诂著作作为了解经释义往往会涉及句法分析，这些句法分析中往往会运用到变换分析。例如《春秋·成公元年》：“秋，王师败绩于贸戎。”《公羊传》分析说：“孰败之？盖晋败之，或曰贸戎败之。然则曷为不言晋败之？王者无敌，莫敢当也。”不难看出，《公羊传》的分析含有“王师败绩于贸戎→贸戎败绩王师”的变换解说。但是它的这种语序变换是为语义表达服务而不是为语法研究服务，《公羊传》指出，《春秋》不说“贸戎败绩王师”是体现作者“王者无敌，莫敢当也”的正统观念。又如，《春秋·桓公元年》“春正月，寔

来”一句，《谷梁传》分析说：“寔来者，是来也。何谓是来，谓州公也。”我们认为，《谷梁传》的分析中含有“寔来者→是（州公）来也”的变换说明，《谷梁传》通过词语替换的办法来显示句法结构之间的语义联系，这当然也是属于变换分析。但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等著作对句法结构的分析是从属于语义说明的需要，具有隐蔽性，它零星分散而不成系统，寄生在训诂释义中，为解经服务而不是为语法服务，其中的所谓变换分析不可能是注释家主观上明确的运用，因而不能满足我们拟定的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第三条“为语法研究服务”、第四条“著作者有主观意识”的标准，也就是说，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不应该归入他们的名下。孙良明先生对我国古代训诂著作中的语法学进行过系统的总结，他说：“汉人注释中变换分析，是以‘自然形态’存在于注释文字中，是笔者从这种‘自然形态’中发现、归纳出来的；不是汉代注释家主观上明确的运用这种方法。”^{[11](p.34)}古代文献中，类似《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变换分析还有很多，如汉代毛亨的《诗经故训传》，郑玄的《诗经注》、《三礼注》，何休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唐人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等等，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同样不属于他们。

我们再看看早期传世的语法学著作。语言学史家认为，南宋陈骙的《文则》“是我国最早一部集中论述语法修辞的专著。”^{[12](p.26)}《文则》其实更是一部辞章学著作，其中涉及句法研究的不是很多，不过在这些不多的句法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变换分析。例如，陈骙在《文则·乙》中说：“《春秋》书曰：‘吴子遇伐楚，门于巢。卒。’《公羊传》曰：‘门于巢者何？入门乎巢而卒也。’然夫子先言‘门’后言‘于巢’者，于文虽倒，而寓意深矣。”我们认为，陈氏的分析中含有变换关系“（人）于巢门→（人）门于巢”。陈骙的贡献在于彰显训诂著作中的句法分析，明确指出了句法结构之间的差异，这种分析是对结构形式的显性分析。但是，陈氏比较《春秋》中的变式句“门于巢”与一般的通用句式“于巢门”的语序变换，主要是为了证明他所倡导的“倒言而不失其言者，言之妙也；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的作文主张。《春秋》中的变式句“妙”在何处？陈氏认为就在于“寓意深矣”。陈骙分析语序变换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追求最恰当最高妙的题旨表达，是为了点化作文的妙法，还谈不上是有意识地运用变换分析法来研究语法，事实上，作者在该著中也没有表明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叫“变换”。可见，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同样也不应该归入陈骙名下。

金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清人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等，多在说解中运用了变换分析的方法，但是他们著述的目的或是为了解经表义，或是为了匡谬正俗，不可能出现方法论的总结。此外，还有如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人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等虚字字典，在以字释字的解说中也用到了变换分析，同样这类著作也没有总结方法论的需要。我们认为，只有著作者有意识地总结方法条例时，

才有可能出现对变换分析的方法总结,也才谈得上作者主观上的有意识的运用。

三、《古书疑义举例》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贡献

清人俞樾 1868 年出版的《古书疑义举例》是一部总结经传条例的著作,较之陈骙的《文则》,涉及到了更多的语法问题,其中的“倒句例”、“蒙上而省例”、“探下文而省例”、“古书发端之词例”等部分与句法研究最为密切,多为后代学人所重。我们认为,在这些句法研究中,俞樾的某些论说已经明显地含有变换分析的思想。例如,他在“倒句例”中说“古人多有以倒句成文者,顺读之则失其解矣”,这种认识观比陈骙的“倒文而不失其文者,言之妙也”和“倒文而不失其文者,文之妙也”的表达在语法学上是一个进步,俞樾的“顺读之则失其解矣”之“顺读之”,更明确地表达出了他是通过句法结构来认识语义的,表明他已经有了语法结构的观念,他的语法观念在该著的具体分析中表现得更为清楚。例如,俞樾对《孟子·尽心下》“若崩,厥角稽首”一句作如是分析:“‘若崩’二字,乃形容厥角稽首之状。盖纣众闻武王之言,一时顿首之地,若山冢之卒崩也。当云‘厥角稽首若崩’,今云‘若崩厥角稽首’,亦倒句耳。”俞樾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古今语言表达在语序上的差异,其中的变换分析思想可表达为:“若崩厥角稽首→厥角稽首若崩,原式是变换式的倒装形式。”俞樾分析的目的落在了“亦倒句耳”上,这正是句法结构观念的具体表现,比陈骙的“寓意深矣”的分析目的更具有语法意识。俞樾的语法观在他的“句中用虚字例”中表述得更为直接:

虚字乃语助之词,或用于句中,或用于首尾,本无一定,乃有句中用虚字而实为变例者……《尚书·君奭篇》“迪惟前人光”,犹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传》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纯佑命”,犹云“惟天纯佑命”也。故《枚传》曰“惟天大祐,助其王命。”乃经文不曰“惟迪”而曰“迪惟”,不曰“惟天”而曰“天惟”,此亦句中用虚字之例,乃古人文法之变也。

俞樾通过对古籍中存在的“迪惟前人光→惟迪前人光、天惟纯佑命→惟天纯佑命”等变换关系的分析,证明了虚字在经传中用于句中与用于句首、句尾,“本无一定”,这就是古人“文法”的规矩。他所指的“文法”当然包括作文之法,但我们觉得他更多的还是指组词成句的结构之法,即接近于我们现今所讨论的“语法”这个概念。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虚词的这种用法“乃古人文法之变也”,这“古人文法之变”的总结足以表明俞樾已经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古人对句法结构的选择、调整,是一种方法——变换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变换分析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有着明晰的概念,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他单独列出的“上下文变换虚字例”的条例中得到证明,更能在该节的论说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古人有叠句成文而虚字不同者……《尔雅·释诂》:“粤、于、爰,曰也。”而粤、于、爰三字,又训“于”,是“曰”“于”义同。《礼记·礼运篇》:“其降曰命,其官

于天也。”言其降于救命者,皆其法于天者也。上句用“曰”字,下句用“于”字,亦虚字变换之例。

尹知章注《管子·戒篇》曰:“为,犹与也。”是“为”“与”义同《列子·仲尼篇》曰:“无言与不言,无知与不知,亦言亦知。”按:上云“用无言、为言、亦言,无知、为知、亦知。”此承上文而更进一义,犹云“无言为不言,无知为不知,亦言亦知”也。上用“为”字,此用“与”字,亦虚字变换之例。

俞樾认为,“其官曰天也”可以说成“其官於天也”,“无言为不言”可以说成“无言与不言”,“无知为不知”可以说成“无知与不知”,这些“叠句成文而虚字不同者”的例子,在俞樾看来都是属于虚字“变换”之例。在我们看来,俞樾的这种分析方法无疑是属于“变换分析”的方法。俞樾通过对古人的大量同义句式的变换分析,证明了他所提出来的“古人有叠句成文而虚字不同者”的条例是客观存在,是真实可信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古书疑义举例》中存在着句法结构的变换、存在着对句法结构的变换分析、这种句法结构的分析为语法研究服务,同时,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也是第一位在语法研究中明确提出“变换”概念的学者。《古书疑义举例》能同时具备变换分析探源研究的五条标准,因此,它应该被认定为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发轫之作。《古书疑义举例》是发凡起例之作,它对对文、异文和译文的角度比同勘异,在这种情况下著者很容易发现“变换”的条例,也自然会出现方法论的总结,得出“变换”这种分析方法,并把它运用到句法分析当中去,用到句法结构的对比研究中去,变换分析的方法论总结出现在《古书疑义举例》中无疑有它历史的必然性。

俞樾的这种变换分析在后来的语法学著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发挥和更好的发展。1898 年问世的《马氏文通》继往开来,在句法分析时已经大量运用了类似俞樾的这种变换分析。所不同的是马氏运用了更为明确的语法规则来分析句法结构。继《文通》之后,语法的著作层出不穷,传世之作蔚为大观。金兆梓 1922 年出版的《国文法之研究》列出了五类基本句式的变换情况,并且在讨论复句结构时,提出可以使用“浓缩”“省字”“移位”“变形”等方法,使句子结构发生变化而表达的意义并不改变,这是对变换的操作方法进行总结的我国最早的语法著作。

金著以后,学者们有意识地运用变换分析的越来越多。除前文提到的黎锦熙 1924 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外,还有 1924 年出版的刘复的《中国文法通论·四版附言》,刘复为了说明研究语法要周到、精细、扼要,用 11 对变换实例作三组分析,另加 3 对“把”字句作推论来探讨“在”的性质,借以说明语法研究“精细”的内涵。我们注意到,刘氏的变换分析已初具形式化,刘著用横杠“——”来表示原式和变换式之间的关系(美国描写语言学家海里斯所创的变换分析的标志性符号是“→”)。1942 年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则是我国早期汉语语法研究在较大范围内运用变换分析的著作。《要

略》详细论述了表态句、有无句、判断句、叙事句变换成词组的种种情况,对单句与复句之间的变换关系也详有讨论,并精辟地论证了句法变换所运用的“以繁驭简”和“以简驭繁”的两项原则。50年代,我国大陆学者多运用变换分析来研究把字句与被字句、长句与短句之间的关系,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商务印书馆,1943年初版,1985年新版)就讲到了被字句与把字句的变换关系,张志公的《汉语语法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就讲到常式句和变式句的变换。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出现的汉语主宾语问题大讨论中,学者多运用变换分析来证明某些名词性结构是主语还是宾语的问题,如陈凡的《分析句子的依据和标准》(《语文学习》1955年8期)、陈庭珍的《分析主语宾语应该根据结构》、唐启运的《语法结构决定主语宾语》(均见《语文学习》1955年9期)等。60年代初,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在朱德熙先生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变换分析与美国结构主义的变换理论相结合,取得的成就和影响自不待言。

四、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的价值

诚如徐通锵、叶蜚声二位先生所言:“变换分析是语法研究中一种固有的方法。”^{[13](p.30)}但是,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变换分析并非与生俱来,它也有一个演变成长的历史过程,从先秦历史文献中的变换到训诂注释中的变换分析,最终发展到语法研究中的变换分析;从为作文表义服务到为训诂解经服务,最终到为语法研究服务,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从这个发展过程中可知,“变换”、“变换分析”、“汉语语法变换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几个概念。语法研究中的变换分析源于训诂释义中的变换分析,训诂著作所用的变换分析脱胎于先秦历史文献中的变换。

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发生、发展是渐变的,这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难以界定的客观原因,也是探源研究的难点所在。但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是不应该回避的。因为从学术研究史的角度看,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总结其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学术著作权的界定,是该门学科发展的标志点。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是汉语语法变换分析

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的标志点,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变换分析从何处而来,如何发展变化,都要从变换分析的著作权这个标志点开始溯源或索流,同时它本身也是这个发展历程中一个不可遗漏的有机组成部分,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在汉语语法学史乃至汉语语言学史中应该有所交代。从变换理论本身来看,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变换分析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变换”、“变换分析”、“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等概念的把握与区分,也有助于我们对自源的变换分析与后来由朱德熙先生引进的美国结构主义的变换分析的把握与区分。可见,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探源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语法学者才不时地提到汉语语法变换分析的著作权,只不过以往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系统,其中的问题尚未引起方家的注意罢了。

[参 考 文 献]

- [1]朱林清.汉语语法研究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 [2]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 [3]吴为章.运用变换理论的先驱[J].汉语学习,1994,(5).
- [4]高更生,王红旗.汉语教学语法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5]胡明扬.刘复《中国文法通论》读后[J].汉语学习,1998,(5).
- [6]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7]于广元.试论《马氏文通》的变换分析[J].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
- [8]吕宏声.关于变换和变换分析的探讨[J].辽宁大学学报,1995,(3).
- [9]陆俭明.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M].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3).
- [10]王显.清代学者在古韵分部研究上的贡献[A].古汉语研究论文集(二)[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
- [11]孙良明.中国古代语法分析方法研究与探索[M].郭锡良.古汉语语法论集[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 [12]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 [13]徐通锵,叶蜚声.“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M].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现状和回顾[C].北京:语文出版社,1987.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陈 默]